

<<忆往叙实>>

图书基本信息

书名：<<忆往叙实>>

13位ISBN编号：9787562447405

10位ISBN编号：7562447403

出版时间：2009年2月

出版时间：重庆大学出版社

作者：李幼蒸

页数：258

版权说明：本站所提供下载的PDF图书仅提供预览和简介，请支持正版图书。

更多资源请访问：<http://www.tushu007.com>

<<忆往叙实>>

前言

为什么学人要写回忆文字或传记文字？

为后人留下个人的经验记录，固然是一个简单的理由，但在迟暮之年花时间写一部所谓个人自传，对我来说，似乎并无什么吸引力。

因为我这一生中并没有发生过什么重要的外部事件。

值得记叙的东西全部是思想性、学术性、精神性的。

它们大多数也已经发表于个人的著、译作品之中了。

不过，个人学术经历中的许多私人观察和体验，有其另一方面的意义。

一方面它们可以作为学术思想的补充；另一方面它们可以反映人际关系与学术思想方式的密切关联。

而我的特殊“弱势”地位，在人生的各个阶段，也使我掌握了独立的观察和体验的角度，让我有了“以小见大”的机会。

所谓“小”是指心迹，所谓“大”是指学术方向。

我的个人经历与经验则呈现了众多“心”与“学”之间的联系点。

现在，我通过若干片断的记叙把这些联系点勾连描画出来，希望有助于读者了解学术世界的另一侧面。

这也是我几年前在网络上陆续撰写片段性回忆文字的主要理由之一。

这些回忆文字的主要部分是我和若干中外学者交往中的特殊经历。

我本仁学“以文会友、以友辅仁”的态度与国内外学人交往，却慢慢发现学术世界的普遍功利主义规律，与我在府右街隐居读书时期形成的人生态度很不一样。

一方面，由此产生了许多人际冲突；另一方面，使我有机会亲身体会到一些学人的行为和心迹的关联方式。

我遂认识到：今日世界的全盘商业化趋向，可能会结构性地阻碍人文科学的进步。

我发现，恰恰是反功利主义的仁学精神，有可能成为当代人文科学健康发展的关键。

世界人文科学的现代化革新，需要一种伦理学指导。

中国思想史上的仁学传统，为未来世界人文科学发展方向提供了正当的“态度学”型范。

<<忆往叙实>>

内容概要

本书是一本带有自传性质的回忆文集，字里行间透露出作者的远见卓识。

在这个学界如江湖的时代，作者在迟暮之年，回忆起与众多文化名人交往，仍情至不能已，或激越，或愤怒，或高兴，或悲痛，或忧伤。

透过李幼蒸的独特经历，我们看到了西学东渐一百多年以来，中国知识分子面对西方文化痛苦抗争的一个缩影，同时还你一个至情至性的李幼蒸。

<<忆往叙实>>

作者简介

李幼蒸，1936年出生于北平。

现为：旅美独立学人，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比较文明研究中心特约研究员，国际符号学学会（IASS）副会长，国际中西哲学比较研究学会（ISCWP）顾问，南京师范大学符号学研究所顾问。

曾于：天津大学土建系肄业（1956—1959年），北京图书馆自学（1959-1966年），膳家研习（1966-1977年），中国社会科学院哲学所助理研究员、副研究员（1978-1994年），普林斯顿大学、哥伦比亚大学、慕尼黑大学哲学系访问学者（1982—1984年），德国波鸿大学哲学所客座研究员（1989-1997年），法国高等社科院（EHESS）访问研究员（1990年）。

<<忆往叙实>>

书籍目录

80年代（1977—1987年）我的治学方向回顾“少年岁月：幼时经历素描中学：我的“文学时代”——忆俄国文学对我的精神影响我的“1957”——走向哲学的那一年我与北京图书馆记“文革”前我与哲学翻译家马元德先生交往二三事回忆杜任之先生——现代西方哲学重建亲历记我与外语——记自学外语50年80年代初与李泽厚谈孔子回应李泽厚——兼论孔孟学为心术学记八九十年代王浩助我二三事80年代我与甘阳交往的片段回忆——兼论我与青年西学“启蒙者”一代我代贺麟为罗蒂书写序——记80年代学界的一则经历我与现象学家泰米尼卡交往的回顾在德努力倡建新型汉学研究所之失败我的“解释学”经历——解释学探讨30年之回顾我的读书与藏书附录国学、汉学和“百年留学生文化”——论理性高于权威（新增改版）仁学三书和学术真理——2007岁末感言后记——兼述仁学和符号学结合之意义李幼蒸主要著译书目

<<忆往叙实>>

章节摘录

2. 高中：俄国小说成为我的精神世界反右运动以前的五十年代，社会文化生活中存在着相对多元化的内容和可能性，这就是对欧美古典文化和文学的基本认同。

一方面这是与马克思主义的传统观点一致的，另一方面这也是与党内以白区为主的文艺知识分子的共识有关。

五十年代是中国在社会、文化、学术从开放走向封闭的快速过渡期。

但是“矛盾”的确存在着：列宁-斯大林式社会主义的政治方向（现实）和西方古典人道主义方向（思想）是本质上对立的。

在此对立性演化为全面冲突以前的六七年中，也就是我在中学的六年中，由于两种政策和思想方式的并存，个人在一定程度上获有在二者之间进行选择的可能性。

大致说来，我的整个中学时代，特别是高中时代，欧美文学得以成为我在革命激情年代的“象牙之塔”：我根本是“生活在”外国文学里的，特别是俄国文学里的。

俄国文学，既是客观环境的赐予，也是我的主观选择。

如果我当时能拥有今日那么丰富多样的兴趣选择，我是否还会选择以俄国文学为中心呢？

回答是肯定的。

也就是说，当时的思想封闭性并未对我的精神成长带来多大的障碍。

我的性格使我的二十岁前成长时光，宜于有一个边界封闭的、方向凝聚的时期：这就是可称之为“文学伦理学”阶段。

在此阶段内，我完全独立地塑造着我的自我。

那时我之所以特别把托尔斯泰的“自我完成”观当作我的座右铭，是完全合乎我的知识水准和性格成长逻辑的。

既然是“自我完成”，也就是精神朝向于我自己，而非朝向于社会和集体。

我在整个中学时代都是“不入流”者，在同学中处于“中偏下”阶级。

政治上不要求“进步”（严格说不关心政治语言，“政治课”成绩永远最差，是六年中唯一有过一次不及格记录的科目。

实际上，我在课堂上根本听不进去），甘愿处于“下游”，如果这样我可以保存更多的自由时间的话。

这是什么意思呢？

<<忆往叙实>>

后记

20世纪末我曾旅欧9年，因此获得了深入体认现代西方学术思想的机会，我的学术实践目标也就从中国扩大到世界，认识到中国和世界，在某种意义上，今日已成为一体。

从此必须从世界角度来看待中国的过去、现在和将来；也必须将中国历史和现代学术融入世界。

但是，另一方面，由于战后世界学术的全面制度化发展，学术的目标、内容、观点和方法，仍然受到学科分隔化和市场化的严重限制。

换言之，一种广义的学术实践方面的“实用主义”，已然充斥于全世界，虽然彼此的实用主义类型不同。

以“成”代“真”的学术观，实已成为商业化时代的一种“通则”。

这样的商业化通则，却与我30年前在北京府右街独自进学时所怀抱的学术动机和目标相反。

30年来我有各种机会来“顺应”各处学术制度化的要求，以有利于和现行学术潮流取齐，但我没有这样做。

因为我的动机和目标不可能还原为个人对“成”的追求。

本书所记叙的我的各种学术遭遇，也就反映了个人学术实践与学术环境之间的各种各样矛盾。

人类社会生存必须有牢靠的制度化保障。

学习和教育，当然须在制度化框架内展开。

我的实际关心为：如何在求“成”的制度性学术环境内，发展学者个人求“真”的学术实践，以及如何对传统思想史进行更有效的科学分析。

这样，我就在30年前“找到了”符号学。

而这个符号学，今日岂非同样正在沿着求“成”的方向前进？

我们于是须遵行一种“学术实践辩证法”：在客观制度化的和主观功利化的学术活动中，设法相对有效地输入求“真”的要素。

未来的“中西思想交流”的庞大实践任务，可以说就是“仁学动机学”和“西方方法论”之间的深入“对话”和“结合”。

<<忆往叙实>>

编辑推荐

《忆往叙实》由重庆大学出版社出版。

<<忆往叙实>>

版权说明

本站所提供下载的PDF图书仅提供预览和简介，请支持正版图书。

更多资源请访问:<http://www.tushu007.com>